

我的生活

冯玉祥 著



旧籍新刊

蔡尚思題

岳麓书社

我的生活

冯玉祥 著

旧籍新刊

蔡尚思题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刘柯

封面设计 胡颖

我的生活

冯玉祥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国防科大印刷厂印刷

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875

字数:460,000 印数:1—3,000

ISBN7-80520-972-3

I·460 定价:2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目 录

第 一 章	我的家世·····	(1)
第 二 章	康格庄·····	(8)
第 三 章	入伍前后·····	(19)
第 四 章	河边的眼泪·····	(31)
第 五 章	光绪二十六年·····	(38)
第 六 章	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	(47)
第 七 章	副目 哨长 队官·····	(57)
第 八 章	两次秋操·····	(65)
第 九 章	新民府·····	(71)
第 十 章	山东道上·····	(81)
第十一章	武学研究会·····	(89)
第十二章	从二月到八月·····	(96)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败·····	(104)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112)
第十五章	左路备补军 (一) ·····	(123)
第十六章	左路备补军 (二) ·····	(134)
第十七章	剿白狼·····	(146)

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	(157)
第十九章	蜀道难(一)·····	(170)
第二十章	蜀道难(二)·····	(184)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193)
第二十二章	从四川到廊房·····	(210)
第二十三章	讨伐复辟·····	(225)
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236)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252)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279)
第二十七章	饥困线上·····	(293)
第二十八章	督 陕·····	(309)
第二十九章	督 豫·····	(330)
第三十章	穷困的陆军检阅使·····	(341)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359)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后·····	(384)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410)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427)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师·····	(446)
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陕·····	(471)
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	(497)
第三十八章	豫东大战·····	(524)
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战·····	(546)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558)
重印后记	·····	(569)

第一章 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我始终没有回去过。（注：民国二十六年春天才第一次回返故乡。）对于故乡，我知道的虽然很多，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于巢县竹柯村；早年家里奇穷，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当裁缝糊口；四叔做一个佃农，替地主耕种着土地；父亲曾一度当过雇工，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一次，祖父病了，家里一文不名，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去摸鱼的时候，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来愈重，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想法子冰上凿一个大窟窿，边上放一盏油灯，引诱鱼望上跳，等到跳上来，他

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风刮得很大，雪花纷纷地飞舞着，父亲如平常一样，照例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入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虑劳碌，也渐渐的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洪杨革命。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的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目前。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这两头，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

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父亲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嚷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两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块，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那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 also 得到很大的愉快。

这里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个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尽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家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因此在父亲未来以前，已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绔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父亲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教师看见父亲穷苦而有志气，工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个时期，父亲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

考期到了，父亲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不知由于怎样的一个机缘，父亲也得到入场应试的幸运。进了试场，两个阔少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有射中，石子不消说也没有举起来。下来了，臊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名落孙山。平素娇生惯养，一点苦功也没有下过，临事自必当场出丑，给爹妈丢脸，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亲与试的结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举得合格，居然入学了。这在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久经折磨的父亲，这时才觉得稍稍吐了一口郁闷之气。

父亲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过一次很大的窘困，说起来也很有趣味。原来父亲佣工的期间，祖母已返故乡竹柯村。故乡虽然并没有可留恋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较外乡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艰难，再三考虑，祖母才离开父亲回乡，为了分在两下，日子更好过一点。父亲入学之后，送报子的星夜到竹柯村报喜。在清代科举盛行的时候，有人专门靠着报喜为生，每逢榜张出之后，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个名字，看清籍贯，即疾驱地拚命跑向目的地去。跑得快了，可以得头报，多赚些赏钱；若是慢了，成了二报三报，就不值钱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

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讯，谁都乐意掏些赏钱，表示自己的快慰的。但是这次报父亲喜讯的报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报子到家的时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裤腿，正在田里插稻秧，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时她的儿子会考取功名。送报的查问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从田里找回来。祖母到了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看见她来了，一拥围上来，乱嚷着贺喜，大家都说她从此苦尽甘来，吉利话说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语说，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艰难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维贺喜，吉利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神经，使她听了伤心；在一片笑语欢腾声中，祖母忽然呜咽起来了。家里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每天两餐饭都发生问题，拿什么招待报喜的呢？一样的喜讯，到了穷人家，便变成了无法应付的难题！后来多亏冯文焕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隐衷，赶快地跑到家里，兜了一些鸡子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发赏给那报子。可是报喜的却大大的不高兴，经邻里多方劝解，才勉强打发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围。

考取武庠，虽然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亲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实含有严重的时代意义，决不是偶然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不住帝国主义炮舰的轰击，终于被迫着大开门户。于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洪流一涌而入，中国旧有的经济政治的壁垒开始发生急遽的变化，满清的封建统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新时代的的开始，其征象就是普遍的农村骚乱与新的政治斗争的酝酿和发展。一八五〇年洪杨革命的爆发，明显地，即是那外来的与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革命运动。经过这次浪潮的泛滥以及战争的延长与扩大，那些和土地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农民，至此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外地。太平军在广西起义，不久即连

续占领赣、皖、苏、浙等省；满清军队与之转战于长江流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的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库，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就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企图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父亲取中武库，是他从军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惨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仅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

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的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着。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津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

第二章 康格庄

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望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

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齷齪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畅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喜地兴高采烈的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回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望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可珍贵的微笑。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功夫顾到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较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长。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的向草地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洽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在在煽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

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笑笑说说，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的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像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干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披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披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披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披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披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刺刺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披。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披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披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

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粘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桠，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磨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唯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典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剗

肉补疮的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叉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的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回答的话说完，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快走！”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的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贴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